# 中国舆论场的二元陷阱与缺席的革命左派：从“南京大屠杀争议言论”说起

*读者来稿*

## 中国舆论场的二元陷阱与缺席的革命左派：从“南京大屠杀争议言论”说起

*读者来稿*

近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某某在课堂上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相关言论，被学生拍摄视频上传至互联网，并且被网友进一步剪辑，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响。正值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这一舆情很快引起官方重视，各大官方新媒体平台纷纷发文斥责这一“错误言论”，而震旦学院也迅速宣布开除该教师。此外，上传这一视频的学生被以自由派为主的声音视为“告密者”，尔后遭到一系列“网暴”，官媒更是顺势将其吹捧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吹哨人”。随着与官方叙事相悖的声音相继消失，就这一事件而言，民族主义的声音似乎在互联网上“大获全胜”。

作为一篇时评，本文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事件本身的梳理和评论，第二部分则结合但不限于这一事件来分析当前中国舆论场所表现出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运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则简要讨论马列主义革命左派在这种形势下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

一、关于事件本身的简要梳理

1、事件的第一阶段：关于宋某某观点的争论

就宋某某引发争议的观点，笔者从如下三方面先进行简要的概括和评价：

（1）在事实层面，她的论述中存在若干关键错误（比如30万数据只是一家之言而缺乏更多史料支持，可以通过身份证来统计），严肃地为自己的立论寻求证据是教师的基本要求，利用自身传道者的地位传播具有很大误导性的信息是不负责任的。但这并不能证成举报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将在下文探讨这一点。

（2）就南京大屠杀数据而言，她的主要意思是：自己完全认为南京大屠杀是反人类的，这一点不以死亡人数为转移；但由于中国学界做历史考证工作不严谨，导致没有拿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国外否认南京大屠杀或缩小其规模的声音。也就是说，国内“盖棺定论”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在国际上并没有被广泛认可，而国内还没有很好地回应他们从资料来源和统计口径方面提出的质疑，因而只能从“政治立场”层面予以谴责。这点侧面提醒我们：对于这类主题，官方主要的“说服”对象不在国际上而在国内。

（3）就其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她认为不应该永远去恨，而要铭记历史、反思战争如何产生。尽管她的“反思”大概仍然来自自由派的立场，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相比于官方和小粉红“合谋”炮制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而言，仍然是有一定进步意

义的。

自由派、民主派的回应：对于（1）忽视或承认，但由于（2）这并不能证成她抹黑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罪名，而是理性探讨，试图确定受害者姓名是从宏大叙事走向人道主义关怀的表现，而对于（3），主张反思战争的原因才能超越简单的民族仇恨和一元思想，是对人和历史的真正尊重。

需要指出，这类观点的持有者与宋某某本人大体上来自相近的社会集团，即主要来自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老一代自由派和新一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此采取了相似的立场，但仍然有一定分歧，这将在下文中分析。

官方媒体（以及某些“左派”评论）对于以上三点的回应是：针对（1）猛攻，作为其历史虚无主义的直接罪证；对于（2）的辩护，质疑该老师的动机，指出就数据可靠性做文章是抹杀日本侵华历史罪状的惯用套路，无论如何都在为历史上的侵略战争翻案，为“反华势力”张目；对于（3），他们进一步指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存在“客观”的反思，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民族主义，即牢记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从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笔者认为，这种论调存在两重歪曲：（1）逻辑上的歪曲：从先验的中式“政治正确”出发，任何对于其立论基础可靠性的讨论，不论是否符合事实，不论是否出于政治目的，都是在反对我方、为敌人利益服务，而且最可恶的是某些“专家学者”在客观性的幌子下“偷运”自己的翻案阴谋。虽然“敌对势力”确实会这么做，但反推出这么做的都至少潜在地是“敌对势力”并不成立；相反，对“敌对势力”的泛化往往是统治者定向打击威胁自身合法性者的策略。（2）实质上的歪曲：混淆阶级观点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混淆百年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和当今自身成为帝国主义的中国。我们同样强烈批判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重罪行，但问题在于，当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系列政治宣传完全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将敌人指向外部以凝聚民族认同，从而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2、事件的第二阶段：“告密者”还是“举报者”

在关于宋某某观点的争论基础上，随着事件发酵（宋某某被学校开除、曝光者动机被质疑），争论进而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学校开除该教师是否正当？（2）学生录视频传到网上“举报”是否正当？

自由派、民主派倾向于认为：即使该教师言论有不妥之处，但她并非出于恶意，而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范围，学生应该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通过网络举报的方式曝光非公开场合的言论，借助公权力介入实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俗称的“赵弹打击”），是非常恶劣的行径。这种有利可图的方式一旦得到许可，就会引发更多人“公报私仇”，导致大举报的恐怖。

官方和民间的民族主义势力则针锋相对：既然该教师的言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触碰红线的，举报就有了合法性。他们认为教学场所属于公开场合，与网络无异，而且作为教师传递错误价值观罪加一等，因而“学术探讨”不构成为之辩护的理由；相反，这位学生（尽管想要“五十万”！）才是不畏权威、坚持正确原则的“吹哨人”！

需要指出，尽管前者经常不假思索地将这类言论审查和举报行为与“文革”、“极左”等标签关联起来，并且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法权来思考权利和自由，但是他们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当今专制政府的统治策略：

以国家与民族利益这一最高层次的“例外”来取代个体“最低限度的自由”的合法性，从而扫清取得市民社会层面认同的阻碍。但是，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今的国家行为以及公众舆论对立的实质，才能走出与民族主义同样简化的自由主义归因（比如“极权主义”、“多数人的暴政”）。

二、当今中国舆论场的阶级斗争形势

实际上，与宋某某同类的事件近年来已经在互联网上屡屡发生：比如，疫情后对方方及其“同党”之言论的大肆鞭挞，以及前日罗昌平律师因侮辱志愿军烈士被警方刑事拘留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此外，从这些事件中官方表态以及网络舆情的分化来看，不同阵营之间的对立已经很清晰，足以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基本的判断。

以罗昌平事件为例。在罗昌平被警方刑事拘留后，自由派人士替他喊冤，觉得他言论虽有不妥但不至于获罪，并试图以他之前作为（南方系）媒体人在反腐上的贡献为其辩解。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小粉红之外，“有良知的”左派同样痛斥这些“公知”、“精英”对革命历史（或“人民的历史”）的污蔑，而对于警方的惩罚，他们迫不及待地代表“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这类事件表明，历史绝非一系列与当下无关的事实，而是始终与现实中阶级斗争的形势相关，被不同阶级集团策略性地唤起、遮蔽或重释以服务于特定的现实目的。如今，随着中国舆论界的重新政治化——“理客中”的退隐和“立场优先”的极化，这一命题正越发得到舆论场上对立各方的公认。然而，由于缺乏革命左派的声音与科学的阶级分析，这些经验现象只是以歪曲的方式反映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

对立的一方面是自由主义阵营，它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老一代自由派，典型代表是（南方系）媒体、部分律师和学者，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下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构成了互联网的第一批居民，他们把文革视为恶政的代表，而要求基于市场的民主、自由与权利，希望市民社会挣脱总体性国家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一群体从势力与合法性上都在式微，只能以“政治自由”这样空洞无力的理由自保，同时强化了他们对“一党专政”全部恶果的信念。其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个较为“年轻”的集团（在成员年龄结构和形成时间双重意义上），其成员以高校学生和进入工作岗位不久的毕业生为主，他们成长在社会矛盾发展到足以自我批判的年代，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水平与高压的生活工作处境之间的割裂激发了他们的受压迫感和民主意识。

对立的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阵营。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民间有急速抬头的趋势，借助中美贸易战这一历史契机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能够跃出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通过舆论力量倒逼国家机器出手镇压。具体而言，这其中包括以城市中产和殷实农村家庭为主的“秩序党”，以及更为年轻的“小粉红”——对自身现实地位的不满加上狭隘的视野导致他们迅速投向民族国家提供的巨大合法性。后者显然具有更强的网络行动力，构成了这一系列举报事件的主要民间推动力。国家机器也乐于借助这些民间力量来塑造自身统治合法性、转移社会阶级矛盾，只是要适时防止民族主义的声音走向极端而引起更普遍的反感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与民族主义同时兴起的还有左翼思潮，但主要仍然停留在反资本的层面，对于国家大体上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在这些事件中，”有良知的“左派不遗余力地投入了由国家与小粉红相互呼应和推动的民族主义“圣战”中，把全部精力放在抨击“汉奸买办”自由派、为革命历史正名上，却一个字

也不提专制政府如何挪用革命历史的遗产、利用民族主义舆论服务于自身统治。这其中包括两种人。第一种人以老左为主，特别是存在“党内健康力量”之幻想、主张保党救国的分子，他们反而会将揭露中国帝国主义面貌的革命左派与自由派在反专制政府、追求政治自由问题上的“临时协议”视为“左右合流”；第二种人以小资产阶级的新左派为主，他们要么对当前国家性质认识不清，要么慑于国家机器（特别是“普鲁士审查制度”）的威力，不敢将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运用于现实中，只能将矛头对准已经成为“纸老虎”的次要敌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天真”地以为他们的文章至少还是在宣传左翼思想，因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正功”。

我们发现，当前阶级斗争的格局——当然，是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形式被歪曲的——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神兔相争，中特得利。无论是站在“左”的立场上揭露这类言论采取错误的政治立场，还是在自由派的立场上捍卫言论自由、反对“大举报”，都未能充分察觉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中特承载着矛盾的阶级使命：名义上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际上又要维护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当然最主要的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可以一边扶贫攻坚、打击大资本，一边扩大市场经济、打击工人维权，因此不同阶级、集团和政治派别，似乎都可以从国家的表态中找到些许合法性，并且借此唤起国家机器来打击市民社会层面的“敌人”，从而使得“波拿巴国家”的行政力量与合法性不断壮大。

同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成为了捏合国内彼此对立的阶级的最主要意识形态。由于中共的合法性奠基于革命历史实践中承诺的共产主义理想，它与现实情形之间的巨大落差很容易使社会不满加倍地爆发出来，乃至从中国革命史中寻找启发当前斗争的政治资源，从而挑战党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由于其历史特殊性同时包含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当阶级矛盾成为中特意识形态的最薄弱环节，历史就必须以民族主义的方式重新书写，并且在市民社会中唤起对于历史“正确的集体记忆”。英烈保护法、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党史学习在近年来才格外提上议程，正是这一政治意图的表现。

从全球帝国主义体系来看，甚至可以说，极力渲染国家之间的冲突，本身就是各国统治阶级“神圣同盟”的组成部分：日本政客可以继续美化侵华战争历史及其战犯，声称中国要求关闭靖国神社是断了日本人的民族之根；中国政府同样可以不断“缅怀历史”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借助谴责那些美化侵华战争历史的日本政客，将一切反思民族主义的声音标定为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由此可见，统治阶级最忌惮的是他们建立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的合法性神话被揭穿，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直接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三、二元陷阱下，革命左派何为？

可以说，如今中国左派在政治上面临着这样的二元陷阱：或是把特色专制政府视为首要敌人，要求首先彻底改变国家体制，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继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把资本家及其喉舌（以“公知”为代表）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视为首要敌人，通过清除这些干扰性力量恢复社会主义。前者的政治后果是，它（至少在民主革命阶段）看起来似乎与自由派、民主派过于相近，而且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很容易失去政治合法性与群众支持。后者的政治后果是，诉诸国家的力量来遏制资本主义，遮蔽了这一事实——官僚资产阶级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最大支柱，或许能在一定时期内争取到“人民”，却使自身滑向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上述关于中国革命遗产的解释争夺战？改革开放以来，自由派以看似去政治化的“后革命叙事”淡化这段历史的救亡色彩，而接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如此才能夺回他们因无力承担不发达地区实现摆脱殖民统治、构建民族国家与推动现代化的任务而错过的历史位置。对此，左派需要创造性地激活革命遗产来打破“后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屏障，但中国革命的历史资源为革命左派与中特官方以及民族主义者所共享，同样是他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焦点。在这个关键的分岔路口，以阶级为核心的解读和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解读，会把趋于沸腾的民意引导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者才有可能通向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通向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马列主义者在舆论场上的缺席，导致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二元陷阱。正如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所示，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无力解决社会矛盾而丧失力量，国家机器的镇压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有组织的政治表达，使得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将无处发泄的国内阶级矛盾引向同样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完成了资产阶级常规制度无法承担的维系自身统治的任务。如今“小粉红”群体与中特的“合谋”，很可能重蹈这一覆辙。

最后需要指出，革命左派应避免以合法方式直接卷入这场历史争论中。首先，这在极化的舆论场上往往导致自己被卷入上述虚假的二元陷阱。特别是按照老左的方式，与国家结盟而空洞地反对“资本”，反而有助于壮大专制政府的力量。其次，无论革命左派能以多么符合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方式阐释中国革命历史，这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性质以及寻找出路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可能造成一系列误导作用。正如列宁告诫我们不能混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百年前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与当今作为意在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已经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性质，而中特恰恰要造成以前者掩盖后者的意识形态效果。因此，重点应该放在揭露当前中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上。最后，相比于历史解释权的争夺，更实质的问题在于国家机器的做法：专制政府以“政治原则”的名义任意打压威胁其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借此在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群众中建构自身合法性。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要求推翻专制政府的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因此应该在这类事件上支持争取政治自由、反对专制政府、反对“小粉红”等沙文主义力量的斗争，同时将其与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者受到的压迫联系起来，揭露自由派和民主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彻底性。